

民国经济

序 言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辛 旗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一种史学新流派，虽说发端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然考其源流，实滥觞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众多形同“口述历史”的 classics 了。“六经皆史”，其中就有大量的口述。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延续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论语》，亦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口述历史”。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问夫子之语也。”《论语》除了其思想、人文价值外，我们从中亦可探寻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俗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其史学价值自不待言，或可称作“有韵之史记”。《礼记·玉藻》中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中国古代早就有专门记载“口述历史”的史官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传统的传承与光大。

“口述历史”项目最初是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拟订并组织实施的。历时 40 余年，共收集整理了 70 多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记忆资料。受访者都是近

现代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知名人物，或是与重要人物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党务要人、民国军政元老、科学教育方面的著名学者、经济及工业界人士、社会名流等，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而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从“台湾口述历史”项目所搜集编撰的120余种访谈录中，精心筛选后，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的。这些内容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丛书》之外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士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列读物。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命运多舛、艰难困苦的时代，亦是一个奋发图强、英才辈出的时代。这套书里既包含了当事人血泪沧桑的经历、颠沛流离的人生，以及一种痛入骨髓的情感，也包含了他们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感叹和抵御外辱、献身民族的理想与志向。这样的历史才是丰厚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但是，该书的口述者大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其忆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所述内容皆为个人所见所闻，其中难免有记忆不周之处，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这就需要我们阅读时能兼收并蓄、去伪存真。他们许多看法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因为它给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只有多面向的历史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也使得这套书的出版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其一，补阙拾遗。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单凭文献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事件，不是没有留下文字，就是重要档案尚未公开，甚至有许多东西被涂上了太多的脂粉。那么这套口述历史，或许可以

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带来一份惊奇与裨益。

其二，承前启后。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书中的口述者是“所见世”，在今天我们这些人是“所闻世”。我们能听到当世人的讲述，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我们亦有责任把这些“所见世”者掌握的资料记录下来，把许多事情弄清楚，留下信史，这样才有“所传闻世”。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才不会因此而断绝，中华文明才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其三，鉴往昭来。回顾近现代的中国，天灾人祸，更迭相加，国破家残，生灵涂炭。如今时过境迁，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处处散发着和谐之气。然《易经》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出版这套书，不仅是要提供一个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完整视角，更是要“以史为鉴”以“知兴替”，从而可拒乱，乃至升平，直至万世太平。

愿我中华民族从此复兴，永享盛世。

泛泛为之一序，无以益其善美。



2009年3月16日

导 言

彤新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启动阶段。民国之初，孙中山就曾疾呼：“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①袁世凯也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②随后的袁世凯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为国内的经济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法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发展状况较好，1914~1936年间资本总额（含外国在华资本）的增长状况为：1914~1920年年均增长5.59%，1920~1936年年均增长8.31%，资本主义工矿业的总产值年均增长7.7%，国民收入总额年均增长1.45%，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0.92%。^③出现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中国陷入最严重的民族危

① 1912年4月18日《民立报》。

② 徐友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0年，第3页。

③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9~370页。

机，经济发展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入非正常轨道，出现了短暂的以西南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繁荣。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引起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经济衰败，民不聊生。1936~1949年，资本总额年均减少5.04%（其中外资年均减少16.85%），资本主义工矿交通业的总产值年均减少4.12%，国民收入总额年均减少2.4%，人均收入年均减少2.87%。^① 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法承担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过程中已经具备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了。

在整个民国时期，经济发展尽管缓慢但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奠定了一些薄弱的基础。就工业程度言，工业资本逐渐增加，在区域分布上逐渐从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内陆腹地推进；在产业结构上逐渐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发展，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增长中的比重逐渐提高。但是在整个民国时期，工业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产值仍然大大低于农业及其他传统经济部门的产值，离工业化差距很大。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国内政局动荡不安造成的。

（一）经济发展的波浪形曲线

考察民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受各

^①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种重大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存在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波动：1912~1920年为第一阶段，受制度初建利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呈现出私人资本为主的较快发展状态；1921~1927年为第二阶段，受列强经济势力和军阀混战的影响，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并行发展；1928~1936年为第三阶段，随着国家政权的相对统一和经济政策的改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发展较快；1937~1945年为第四阶段，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本国资本严重受挫和外国资本畸形发展的状态；1946~1949年为第五阶段，随着国民政府对日资企业的接收和内战的全面发动，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衰落，国家资本急剧膨胀。不过，本文为了分析方便，仅从1912~1936年、1937~1949年两个较大的阶段进行分析。

据资料统计，我国发展经济的资本总额在1936年以前是持续增加的，在1936年之后却大幅度跌落，1911~1914年国内资本总额计为483 845万元，1920年为719 882万元，年均增长5.59%；1936年资本总额为2 580 387万元，年均增长8.31%，1947~1948年为1 424 518万元，增长率为-5.04%。不过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从1936年的31.27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55.408亿美元（按1936年的汇率计算合186.48亿元），占1936年资本总额的72.27%，东北地区、合肥西南地区和上海的本国资本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恢复。^①

显然，外国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11~1914年为38.16%，1920年为33.20%，1936年为35.96%。在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31、734、727页。

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更高，这三个年度分别为 57.16%、51.56%、57.23%，1945 年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① 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尤其是工业化的进程，是与外国在华投资同步发展的。

从产业资本来看，其增加的速度快于商业资本，资本数量及其所占的资本总额的比重也从 1920 年的第二位占 35.83%，上升到 1936 年的第一位占 38.71%，工业的资本主义进度有所加快，私人资本也出现了较快增长的势头。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现代产业所占的产值比重，1920 年分别为 31.34%、18.19% 和 50.47%，1936 年分别为 9.63%、32.46% 和 57.91%，其中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程度处于领先地位。就资本主义现代产业的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而言，1920 年时为 15.40%，1936 年为 23.80%。^②

1937~1945 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使中国的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一方面在沦陷区内大量的华资企业生产力遭到重大伤害，甚至被劫夺，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要义的发展目标，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时工具；另一方面在抗日后方，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以及战争地区大量华资企业、文化教育机构的内迁，后方经济建设出现较好的发展，使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工业布局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由战前的集中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江浙等沿海沿江城市及地区向内陆和边远的西南地区迁移。从 1937 年 8 月工厂内迁开始到 1940

^①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917 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740、743 页。

年底初告结束，内迁的厂矿共 639 家，其中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 448 家，闽浙两省自行内迁的 191 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约 12 万吨，资本总额在 1 亿元以上。而在 1937 年时，西南地区的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七省，共计只有厂矿 237 家，资本总额仅为 1 520.4 万元，^① 远不及内迁厂矿的数量和资本额，厂矿内迁使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陡然增加了数倍。可见，内迁厂矿对西南诸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巨大的基础并带来了短暂的战时繁荣。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很多厂矿企业又纷纷迁回原址或沿海沿江工业发达地区，西南诸省的工业发展遂从战时的高峰状态转入停滞和低落。显然，内迁企业发挥的作用很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何其巨大。

抗日战争时期的厂矿内迁，通过内迁企业的复业、扩展，并带动新企业的建立和当地旧有企业的改造发展，西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1940 年已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和宁雅八个工业中心区。西南七省的工厂数及产业资本也从 1937 年 237 家、1 500 多万元增加到 1942 年的 3 188 家、2.9 亿元（战前币值），1944 年的 4 665 家、4.55 亿元，分别是 1937 年的 19.6 倍和 30 余倍。^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抗战胜利时，西南地区工厂数及资本额的较快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厂矿内迁直接带来的，而绝大多数是在内迁厂矿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工厂内迁后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使大后方工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92、95、97 页。

②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101、102 页。

业的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到1944年1月，国统区的工厂已达5266家，资本总额4.87亿元，工厂数和资本额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其中，西南、西北、湘、桂等7省工厂总数达4665个，占国统区总数的88.6%，为1937年7省工厂总数的19.6倍；资本4.55亿元，占当时国统区资本总额的93.4%，为7省1937年资本总额的45.5倍。从部门发展来看，到1944年，国统区钢产量达到1.8万吨，生产各种机器3.4万台，拥有大小轮船100多艘，与1938年相比，到1943年，煤的产量增加40%，电力增加97%，水泥增加63%，面粉增加172%。^①

(二) 统制经济无法救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其所施行政策的实际内容和发展轨迹上看，其推行的是统制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制权是其一贯的方针。就实施的效果来看，统制经济在抗战期间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整个民国时期来看，统制经济的政策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政府能够支配的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本有限并且不够强大，而对于民间资本的打压和忽视，整体上造成了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的产生。

^① 孟英：《浅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经济基础》，《唐都学刊》1996年第1期。

下面来看一下统制经济的发展情况。1927~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施行统制经济的意向越来越明确。首先从金融整顿开始，建立和强化国家财经控制系统，到加强对工业和交通的控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并把私人资本工矿业发展纳入国家计划指导范围，其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发展统制经济的政策。1933年实业部拟定的四年实业计划中，就已经有对保险、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实行国家通盘筹划，以求积聚经济实力的内容，表明国民政府至少已经流露出施行统制经济的意向。1934年，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一批有关物资统制的计划、纲要，如国防设计委员会计划部制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等；资源委员会制定了《统制全国钨锑矿方案初稿》、《钨锑统制实施纲要》，以及对“食品及重要农产原料、矿产品、工业、贸易、交通、财政金融、人员等七大类数十项临时统制动员计划”。^① 1935年蒋介石在《全国总动员要义》中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基本前提是组织与统制”，同年10月又进一步提出：“一切人、财、物力，都要在中央政府整个国策与全盘计划之下，严密地统制起来。”1937年8月至年底，国民政府为了应对突发的战局，紧急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增进生产及调整贸易办法大纲》、《战时粮食管理条例》和《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条文，以求迅速地将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状态。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标志着国民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经济方针已经基本确立。1939年3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宣布“依于

^① 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战时人民生活之需要，分别轻重，斟酌缓急，实行统制经济”^①，正式明确使用“统制经济政策”这一概念。此后一直到1941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数十个有关经济统制的具体法令，其范围涉及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对包括工矿、农商、粮食、金融、外汇、物价、物资等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部门进行了全面统制。1942年3月，在严峻的战略相持阶段下，国民政府又颁布并实施了《全国总动员法》，声称“对全国任何一人一物，悉加以严密组织与合理运用，使成为一坚强之战斗体系”。这就是国民政府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发展脉络。

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发展工业方面，政府先后制定过许多计划，如建设部曾公布过《十年实业计划》，实业部出台过《实业四年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出台过《三年发展规划》，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是，这些计划没有一份付诸实施。唯一的例外，是资源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因资源委员会直接受命于蒋介石，因此能够总揽战时经济发展全局，作用甚大。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对政府进行改组。在经济机构方面，原计划把实业部、大本营第三部、全国经济委员会（除公路处归交通部外）、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部，由翁文灏任部长，钱昌照、何廉、秦汾任次长。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在工作范围和性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1938年2月28日公布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资源委员会的职掌为：“一、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

^①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著：《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集，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4年印行，第416页。

二、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及管理动力事业。四、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① 尽管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的隶属关系从军事委员会转到经济部，但是资源委员会遇有重大事项，仍旧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汇报，蒋介石也直接向资源委员会作指示。

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的扩张是异常迅速的，成为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主管机构。它垄断了国统区的煤、电力、燃料、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电机等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非常薄弱、数量有限的工矿企业又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工业极其微弱。随着资源委员会的急剧膨胀，国统区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重起了重大的变化。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国营企业垄断了煤、钢铁、石油、电力、机械、电机、化工和有色金属等重要的工矿部门。国营企业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其中机械制造业占73%，化学工业75%，电力和电机工业89%，冶炼工业90%，而汽油、煤油以及有色金属如钨、锑、金、铜、锌的生产则完全为资源委员会独占。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扩张到121个，其中包括电厂26个，煤矿19个，石油矿2个，金属矿14个，金矿2个，冶炼工业9个，电器工业5个，化学工业37个，机械工业7个^②，成为集工、矿、贸、电力、服务机构为一体的超大型工业集团。

经济统制政策的优势是从经济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得以维持下去，推动了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行粮食管制、物资管制和专卖政策政策，解决了后方广大军民的基本生活

^① 资源委员会档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② 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问题。此外，国民政府对盐、糖、火柴、烟类实行专卖。在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维系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各级政府得以照常运转，维持了后期的抗战局面。国民政府利用金融统制政策，保证了军费支出和生产的需要。抗战大后方经过五年的发展，据 1942 年统计，已建立健全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纺织、食品等上百种行业，形成了一个基本能自给自足的较完整的体系，初步形成了西南工业的基础结构，从而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由于殖民地经济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极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还形成了以重庆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工业新格局。这种工业中心的形成，是经济中心形成的最显著的标志，它对近代以至现代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统制经济的施行，造成国家垄断资本的空前发展，严重打击了私营企业，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在政府的政策倾斜下，国家垄断资本处处挤压民营工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从 1942 年以后，私人资本企业开始大幅滑坡。工厂的开工数日益减少，如重庆原有私人资本工厂 871 家，1943 年停工减产者达 270 家。产品产值也大幅下降，私营工业产品产值以 1942 年为最高，达 7 999 万元，但 1943 年较 1942 年下降了 7%，1944 年较 1943 年下降了 14%，1945 年较 1944 年下降了 11%。^① 而国家资本企业此时却趁机对私营资本企业进行接管和吞并。另外，国民政府以物资匮乏为借口，对物资实行管制和专卖，政府却贱买贵卖，结果加剧了黑市的兴旺，使投机日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流向

^① 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0～371 页。

商业进行投机。这些都对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市场经济无法得到健康发展，这既为国家垄断资本在战后的急剧膨胀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来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也为国民党政府经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物力、财力极其有限，而政府支出费用又难以降低，由于当时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赤字的财政垫款，使银行界的流动资产大大减少，导致国家银行货币的空库与流通周转不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曾提出实行战时财政，贯彻有钱出钱的原则，开征战时利得税等建议，但未获采纳。政府却采取了增发货币的措施，战前，银行发行货币须有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有价证券的保证，但这时纸币的发行却没有这些限制，结果，纸币的发行节节提升，1940年纸币发行量达到151亿元，比1939年增加了250%以上。到1940年以后，随着抗战的深入，经济环境日益恶化，用于稳定法币的外汇也被用尽，物价直线上升，通货膨胀成了脱缰之马，1942~1945年间，法币增发了10 168亿元，比1941年底增加了67倍，^①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纸币增发越多，物价上涨越快，财政赤字也就越大。国民政府企图利用财政金融的统制政策对财政预算和银行系统进行控制，以适应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的需要。其年年增发的纸币不仅无法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障碍。这种情况到解放战争时期，终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全面崩溃的导火索。

^① 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三) 团聚在抗战大旗下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国统区只剩下了西南、西北、湘、桂等省和鄂、粤、闽、浙、赣、苏、皖、豫、晋等省的一小部分。这些省份和地区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后方，大量公教人员和军队的给养都靠大后方来承担。而当时后方工业落后，依靠外援无着，百货匮乏，物价飞涨，国统区陷入了经济混乱和困境之中。据 1937 年经济部统计，全国工厂总数为 3 935 家，而上海一地就有 1 235 家，约占总数的 31%，其他沿海各省共有 2 063 家，约占总数的 52%。战事的发展也形成对国民党政府的巨大经济压力，当时军火 3/4 靠进口，而海口全被日军封锁，主要靠苏联援助。同时，难民大量涌向后方，国民党军政中心也撤向内地，加重了后方社会经济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开发重建后方经济，发展战时生产，保证前线和后方的需要，维持后方社会经济的稳定。紧迫的形势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扶植后方工业的措施，主要有：（1）支持工厂内迁。（2）鼓励大生产采取增产措施。如增大资源开发，扶植航运，修筑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对原有工厂的扩大和新建厂矿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等。（3）鼓励发明创造。

在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扶植下，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在硝烟和炮火中艰难开展，军民一心，共御外侮，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么承续已有的规划迂回实施，要么是呼应战时需要辟路浚河，要么是积极参与国际各项合作活动，大后方呈现了一派繁荣

复苏的经济景象。

首先是战时厂矿内迁的发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开始着手实行经济撤退，转移工业经济重心，在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长期抗战。资源委员会指派专门委员林继庸前去办理。林继庸奉命到达上海后，组织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并凭着自己与上海工业界的关系，积极争取工业界的支持与合作。他邀约上海工业界名人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颜耀秋等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自助组织，官产结合，共同商讨迁厂事宜。

工厂内迁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主要是“迁”、“建”、“产”三项，此三者环环相扣，而“迁”又是工厂内迁工作首要的重头戏。经费不足和交通运输紧张是迁厂工作面临的严重困难。林继庸尽其所能，进行交涉和疏通，为此连日奔走，以致左脚受伤，仍拼命工作，感动了许多工业界人士。随着战局的变化，纷纷要求内迁的工厂不断增多，内迁工作越来越大，已非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所能担负，需要一个专责机构来统筹一切。9月27日，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对全国工矿事业负促进调整之责”。11月1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设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林继庸为委员兼执行组组长，驻上海继续负责工厂内迁事宜。在上海工厂内迁期间，尽管负责机构更异，但林继庸一直担负着督导的任务。他以自身工业实务的专长，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在广大实业界人士的支持和努力下，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时，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其机器及材料已安全抵达武汉者共重14600多吨，抵达武汉的技术工人有2500多名。这个数字虽然仅为战前上海工厂的1/10，但在兵马倥偬之际，有此成绩已是难能可贵了。